

# 《金瓶梅》研究三十年

## ——《金学丛书》（第二辑）述评

张进德\*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开封 475001）

**摘要：**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金学丛书》（第二辑）汇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金学领域最具代表性的31位学人的研究成果。这套反映当代金学全貌的专题文库是对大陆研究最为红火的30年金学成果的总体检视，折射出了金学所具之文学史、学术史的重大意义，以及值得研究界珍惜和借鉴的学术精神与学术品格，同时也给予我们有关文化建设事业方面的借鉴与启迪。

**关键词：**金学；三十年；《金学丛书》；价值

吴敢、胡衍南、霍现俊三位教授主编、汇聚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金学领域最具代表性的31位学人共计30册的“金学丛书”（第二辑）于2015年6月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发行。这套《金瓶梅》研究精选集的出版，是金学研究的一大盛事，是海峡两岸合作共同促进学术繁荣的一个典范，更是中国学术的一大壮举！

—

在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自明中叶《金瓶梅》出现，英雄神怪称霸说部的局面被颠覆，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怪妖魔、世情小说四大流派的格局基本形成，后世小说的发展，即是在此框架下延续或分蘖的。与其他三类小说迥异，横空出世的《金瓶梅》不仅破天荒地打破了中国小说以帝王将相、绿林豪杰、妖魔神怪为表现重心的创作传统，其聚焦于作为社会单元的一个家庭，以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为描摹对象，一下子拉近了小说创作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全面再现了明代社会的众生相，使说部从此有了“百科全书”式的内涵丰厚的巨著，更在于其萌发的从对历史政治的单向辐射到对家庭社会的全方位透视、从对天下兴亡的关注到对平凡人生的体察、从“文以载道”到文学对人本位的复归的全新的小说创作思维，引领着说部发展的合乎艺术规律的走向，标志着小说意识的真正觉醒，引发了中国小说观念的全面革新，它也因此成为中国小说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杰作<sup>[1](P153)]</sup>。故而，几乎在《金瓶梅》问世的同时，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就将

---

\* 作者简介：张进德（1960—），女，河南大学文学院、国学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戏曲、小说。

它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并称为“字内四大奇书”<sup>①</sup>；清初著名青年评论家、彭城张竹坡更是将其誉为“第一奇书”；而代表我国古代小说最高峰的《红楼梦》，在深谙其创作三昧的脂砚斋看来，可谓是一部“深得《金瓶》壶奥”<sup>②</sup>之作。1924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金瓶梅》做了深刻的论述，认为“同时说部，无以上之”；20世纪30年代郑振铎、吴晗等老一辈学人发表鸿文亦高度肯定其创作成就；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五次评论《金瓶梅》，从政治、经济、历史等方面肯定其丰富的内涵，认为“《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sup>[2](P235)</sup>。《金瓶梅》已经成为一部具有世界意义与影响的名著，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和研究者的高度关注。

关于《金瓶梅》的研究，自诞生之日即已开始。它刚一问世，就惊动了当时的文坛，在袁宏道、沈德符等十几位士大夫中传阅抄写。他们在相关笔记、书信及序、跋中充分肯定这部旷世奇书的成就及地位，并就小说的作者、时代以及创作意旨等问题表达了各自不同的见解；小说的艺术描写、人物塑造受到了他们的广泛关注，并由《金瓶梅》有关男女私情、两性关系描写的文字，引发了褒贬不一的评价。有清200多年间，评论形式虽然还是局限于文人的序、跋、笔记、札记，但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较明人有长足的进展，比如关于作者及创作动机的进一步探索，“淫书”说与“非淫书说”的驳辩论争，对诸如文心、语言、结构、细节、场面等艺术独创性的充分肯定等，尤其是康熙年间张竹坡10万余言和光绪年间文龙6万余言比较系统而全面的评论，在《金瓶梅》研究的历史上具有开拓性的功绩，开创了《金瓶梅》研究的新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界对《金瓶梅》创作动机的阐述和对其内容与社会批判价值的高度赞誉，无不体现出时代特点。《金瓶梅》的艺术成就，诸如《金瓶梅》对中国古典小说题材领域的开拓，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描写人物手法的新变，人物语言的高度个性化，陪衬、穿插等手法的妙用，都受到了评论者的充分肯定。20世纪20至30年代，鲁迅、郑振铎、吴晗对其的“世情小说”特质、人物形象内涵、文本与社会生活关系、作者、著作时代、社会背景等均给予深刻的论述，此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学界围绕其成书性质、是否为现实主义之作以及人物形象等问题展开了争论。经过历代学人的推波助澜，80年代，一门新的与“红学”相颉颃的显学——金学，在世界学坛焕发出耀眼的光彩，形成了中国大陆、台港、日韩、欧美四大研究圈。30年来，金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汗牛充栋，研究热点接连出现，研究方法不断更新，《金瓶梅》的思想蕴涵与文学成就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挖掘与肯定。据吴敢等统计，截至2014年年底，在中国出版、发表的金学成果约计有专著350部，论文近4000篇，博士、硕士论文230多篇，作为《金瓶梅》的诞生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金学“当仁不让也当之无愧地走在了国际金学的前列”<sup>[3](P70)</sup>。

文学创作手段的演进离不开前人的艺术积累，而研究水平的提高同样要基于前人丰厚的成果积淀。于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出于总结既往、开启未来的需要，到了世纪之交，便有诸多学术回顾的综述性文章和若干总结20世纪学术史的著作问世，诸如张燕瑾、吕薇芬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黄霖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

等,而各种研究资料的汇编与之相得益彰,更为人们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就金学而言,在中国大陆,明清至建国前的研究文献,已被朱一玄、侯忠义、王汝梅、方铭、黄霖、周钧韬等所编的《金瓶梅资料汇编》《金瓶梅资料汇录》《金瓶梅资料续编》等搜罗殆尽,20世纪50~70年代之前由于小说文本的罕见而使得研究受到极大限制,区区60篇左右的论文也难以与其他小说名著研究的成果相提并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金瓶梅》词话本、绣像本、第一奇书本在中国大陆的陆续刊行,金学焕发出勃勃生机,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辉煌。这种情况下,出版这套反映当代金学全貌的专题文库,既是对大陆研究最为红火的30年金学成果的总体检视,又是荟萃一代金学文献总集,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迎接金学灿烂的明天立此存照,其嘉惠后人、沾溉学林,于金学乃至中国学术,可谓功莫大焉。

## 二

作为一套荟萃中国大陆当代金学主力阵容,“涵盖了金学的所有课题方向,代表了当代金学的最高水准”<sup>③</sup>的丛书,第二辑《金学丛书》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与价值。

首先,它是当代中国大陆金学队伍主力阵容的一次盛大检阅,反映了老中青三代学人30年研究《金瓶梅》的实绩。从年龄组成上看,这套丛书的31位作者,汇聚了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徐朔方、宁宗一、傅憎享、周中明、王汝梅、刘辉、张远芬,40年代的周钧韬、鲁歌、冯子礼、黄霖、吴敢、叶桂桐、张鸿魁、陈昌恒、石钟扬、王平、李时人、赵兴勤,50年代的孟昭连、陈东有、孙秋克、卜键、何香久、许建平,以及60年代的张进德、霍现俊、曾庆雨、杨国玉、潘承玉、洪涛诸位先生的金学成果。30年来,这些学者大多倾力于《金瓶梅》研究,参与并见证了金学的辉煌历程,自然也成为金学的中坚力量。研究队伍的年龄结构、梯队阵容不仅是衡量研究对象本身价值的重要参照,更是考量这一研究领域生命活力以及研究前景的重要标志。丛书作者的年龄、梯队,正从以上两个方面反映出《金瓶梅》的不朽价值与金学强大的生命力。从地域的分布看,丛书作者分布于北京、上海、天津、吉林、山东、河南、浙江、江苏、河北、陕西、江西、云南、辽宁、安徽、深圳、香港等省份和地区,如果连同“金学丛书”第一辑的作者,以及活跃在欧美、日本、韩国、俄罗斯、港澳地区的金学专家,金学研究不仅在中国大陆遍地开花,而且形成了具有世界影响的强大研究阵容。

其次,从研究的视阈来看,大凡中国学术完成从传统向近现代转型、小说概念确立、研究对象固化以后,小说系统的所有构成要素,几乎都被纳入了研究者的视野。

对作者、成书年代、成书过程、成书性质、版本等问题的考证,是构成金学的第一个层面,丛书中老、中、青三代学人多有相关论述。关于《金瓶梅》的作者,是争论到今天尚未解决的一桩悬案,学界根据相同和不同的文献材料,从各自不同的视角提出的有具体姓名和无具体姓名的候选人已经有80种之多。尽管在方法论上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学界对这些观点基本能够包容并冷静、客观地对待。进入21世纪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仍有学者继续就这一问题探赜索隐,二是对这种探讨

本身意义与价值的褒贬臧否。关于前者，承续个人独立创作说与世代累积创作说两大阵营的争论，学界给予了进一步的探讨与驳辩；关于后者，即出现了《金瓶梅》作者问题研究中的否定派，不仅叫停《金瓶梅》作者问题的探讨，而且否定其意义与价值，并由此引发了肯定派与否定派之争。关于成书年代，在明人“嘉靖说”、清人“万历说”的基础上，出现了调和明清人成说的“嘉万说”“隆庆说”“隆万说”等。关于成书方式，在明清人“个人创作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世代累积说”，并就此展开了激烈论辩。关于版本研究，这是《金瓶梅》研究的基础工程之一，也是金学文献研究中与作者研究同样重要的问题。《金瓶梅》早期抄本今已不存，传世的词话本、绣像本（或曰崇祯本）及第一奇书本（或曰张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直受到学人的关注。一般认为，词话本早于绣像本，且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修改加工而成，二者应该是“父子关系”，但持不同见解者也大有其人。如在1934年，吴晗就推断词话本不是《金瓶梅》的第一次刻本，在它之前已经有过几个苏州刻本或杭州刻本行世；韩南在20世纪70年代也提出崇祯本系统并非源自词话本系统；20世纪80年代后则相继出现了《新刻金瓶梅词话》不是初刻，而是二刻、三刻甚至是清初所刻诸多观点，梅节《〈新刻金瓶梅词话〉后出考》甚至提出文人说散本即绣像本先出，词话本后出，崇祯本和词话本关系虽异常密切，但并非改编自后者，它们源自一个共同的祖本，是“兄弟”关系或“叔侄”关系，并不是“父子”关系。针对这桩学术悬案，黄霖《再论〈金瓶梅〉崇祯本各本之间的关系》对各崇祯本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梳理与论证，重申崇祯本是词话本的评改本。他又在《〈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刊印的几个问题》<sup>[41] (P177)</sup>中，通过对“新刻”一词的辨析，结合明人的有关记载，重申这部《新刻金瓶梅词话》即是初刻本，刊成于天启年间；又结合文本的避讳与卷题情况指出，目前所见的崇祯本必据目前所见的《新刻金瓶梅词话》修改后成书，二者应是“父子关系”。此外，对抄本的问世时间与流传轨迹、1933年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本的印数与印次、《金瓶梅》最早刻本问世的时间、今传《新刻金瓶梅词话》究竟刻过几版及卷首的三篇序跋、第53回至57回“陋儒”补作、绣像本的刊刻年限与写定者作评者、第一奇书原刻本及评语与卷首“序”的作者谢颐等，学者都作了细致深入的探讨。1985年，刘辉在柏林寺北京图书馆浏览《金瓶梅》的版本时，发现了直接写于“第一奇书”在兹堂刻本上的文龙所写的6万言的评语，由于此本并未付刻，所以从未见诸著录。这个发现，无疑是《金瓶梅》研究中的一个新收获。在明清绣像本评点者、张竹坡和文龙三家对《金瓶梅》的评点中，张竹坡可谓集大成者——在《金瓶梅》的版本史上，“第一奇书本”是有清一代影响最大的一种版本，而对评点者张竹坡的有关情况，却一直扑朔迷离，莫衷一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马廉、孙楷第等曾对张竹坡的生平、籍贯、家世等有关问题进行过探讨，但资料的匮乏使得他们的研究难以深入。进入20世纪80年代，围绕这个问题的探讨，成为金学的一个热点与亮点，刘辉、王汝梅、陈昌恒、黄霖、吴敢等人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尤其是身处张竹坡故乡的吴敢利用地利之便，遍访张氏后裔，终于访到了刊刻于乾隆四十二年的《张氏族谱》、康熙六十年刊本《张氏族谱》、道光五年刊本《彭城张氏族谱》以及光绪十六年抄本《曙三张公志》等大量珍贵的史料。1987年，吴敢将先后发表的20余



篇文章结集为《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张竹坡与金瓶梅》两部专著。经过吴敢等人的努力,张竹坡的家世生平、著述思想终于大白于世。刘辉《〈金瓶梅〉研究十年》高度评价道:“如果说国内学者在《金瓶梅》研究中,不少问题还处于探索阶段,只是取得一些进展的话,那么,在《金瓶梅》重要批评家张竹坡的家世生平研究上,则有了一个明显的突破,完全处于领先地位。吴敢新著《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张竹坡与金瓶梅》对张竹坡家世生平的翔实考证,尤其是他发现的乾隆四十二年刊本《张氏族谱》和其中的《仲兄竹坡传》,一经刊布,即成定谳,为国内外学者所首肯。”<sup>[5](P222)</sup>张竹坡家世生平得以全面揭晓,极大地推动了张竹坡《金瓶梅》评点的研究,整体研究和专题研究的论文批量出现。更为值得称道的是,张竹坡研究的成果无一例外地被之后的各种相关理论著作诸如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之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陈谦豫《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王汝梅等《中国小说理论史》、孙琴安《中国评点文学史》、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黄霖主编之七卷本《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宁宗一《中国小说学通论》以及傅璇琮、蒋寅主编之七卷本《中国古代文学通论》等或借鉴或采纳,直接影响到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小说理论史、中国评点文学史、中国文学研究史、中国文学通论、中国小说学等多门学科的建设。

对作品思想价值与艺术成就的探讨,是文学研究的终极旨归,也是金学的重头戏,丛书作者于此多有相关的论述。围绕《金瓶梅》思想内容的讨论,出现了主旨意蕴、文化内涵、性描写评价以及人物形象等研究热点。关于《金瓶梅》的创作主旨问题,早在明清时期,人们已就此发表了见仁见智的看法,提出了政治寓意说、世戒说、讽劝说、复仇说、苦孝说、财色说等不同说法;进入20世纪后,这个问题仍然成为金学领域的热门话题,鲁迅、郑振铎联系小说所反映的明代现实社会内容,分别提出了世情说与写实说;嗣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出现了劝诫说、宣扬儒教说、封建说、暴露说、情色说、影射说、讽喻说、性恶说、变形说、新兴商人悲剧说、商人社会写照说、市民写照说、人生欲望说、人欲张扬说、人格自由说、精神危机说、黑色小说说、愤世嫉俗说、人性复归说、反腐败说、性自由悲剧说、探讨人生说、文化悲凉说,等等,将研究由原来的社会、历史、道德、心理等层面扩展到人类、人性、自然、哲学、宗教等多重层面。这其中,既有社会、伦理、道德层面的分析,也有美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探讨,更有立足于哲学、宗教学视点的关注,论者都能透过《金瓶梅》描写的文化现象发掘深邃的文化精神,并给予形而上的文化哲学思考,使《金瓶梅》的丰富内涵得到了多重挖掘与全方位的揭示。如此,既标志着金学本身文化研究的深入,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文化研究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深化与开拓。

《金瓶梅》成功地塑造出了一大批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上自帝王权臣,下至市井平民,三教九流无所不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有数十人,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典文学人物画廊,且这些人物大都纳入了研究者的视野。30多年来,学界就《金瓶梅》的人物形象继续展开探讨,从社会学、心理学乃至经济学、哲学、宗教等多维度来解读人物形象,对西门庆、潘金莲形象的研究尤为突出。围绕西门庆形象的讨论,主要表现在身份认定上,继前人提出的土豪劣绅、地主恶霸商人三位一体、商人官僚恶霸三位一体

等说之后，近人论点更集中于其商人品格的定性上，即他是新兴商人、特权商人，还是封建商人。潘金莲被人指为“千古第一淫妇”，张竹坡在评点中更是痛加贬斥“金莲不是人”。20世纪前中期，研究者对潘金莲有简单定性、一笔抹杀的倾向，以道德评价取代了审美探索，以阶级定性代替了艺术分析。20世纪后期至今，学者对潘金莲形象的研究则逐渐深入全面，即注重对其多重性格成因的全面考察及审美意蕴的深入挖掘。不少探讨文章已将对潘金莲形象的研究上升到文化人类学、社会历史学以及文学史学的高度给予观照，颇具哲理色彩，令人耳目一新。此外，西门庆的妻妾吴月娘、李瓶儿、孟玉楼，婢女庞春梅、奴仆以及宋惠莲、帮闲应伯爵、妓女、相士、官僚等形象也都有相关的文章给予探讨，这标志着《金瓶梅》人物形象研究的全面开花。

对于《金瓶梅》床第描写的评价，历来观点判若冰炭，甚至导致对这部名著取舍态度的迥异。与传统的评判有别，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在指出失误的同时，或从哲学的角度肯定这些描写有张扬人性的价值，或以文化的眼光透视深刻的文化意蕴，或从文学的视角肯定这些描写大多有助于形象的塑造与情节的展开，有助于作品主题的深化。如此讨论的视角显得多元化，结论也更加客观化。

随着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文化热”现象，从文化学的角度对《金瓶梅》进行全方位的审视，构成了金学园林一道新的景观。研究者将研究的视阈扩展到整个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中，由《金瓶梅》文本所涉及的各种现象入手，从历史、地理、饮食、节令、婚丧、礼仪、宗教、哲学、经济、服饰、建筑、科技、商贾之道、民风世俗、人性人情乃至语言现象等方面全方位探讨《金瓶梅》的价值意蕴。另外，有关《金瓶梅》的素材源流、对后世世情小说特别是《红楼梦》的巨大影响，学界也都发表有大量的论文和专著。

关于《金瓶梅》的艺术成就，学界早已就叙事模式、美学贡献、语言艺术、人物塑造等方面做了广泛的探讨，孙述宇的《金瓶梅的艺术》、周中明的《金瓶梅艺术论》、张业敏的《金瓶梅的艺术美》、曹伟和宁宗一的《金瓶梅的艺术世界》等都是这方面的力作。而有关这部旷世奇书的艺术结构，是30年来学人集中探讨的问题之一。如许建平提出小说以西门庆为中心，与他交往的三个群体主要人物的活动构成全书的性爱生活线索、官场活动线索和商场活动线索，彼此交织形成了相对集中、由点及面、多线环绕交错的波放态环式网状结构；《金瓶梅》创造了一种大不同于前的新的小说叙述模式模板：叙事顺序与结构由单线纵向式演变为多线纵横交叉式，叙事的空间与时间展示由平面线性的跳跃式演变为立体展放式，叙事意象结构在作纵向叙述的同时更注重意象间的横向联系，叙事焦点则是由事向人再向人的本质的个性化的转换<sup>[6](P145)</sup>。张远芬认为李外传、西门庆、庞春梅三人之死是小说的大关节，把整部书分成蜕变、聚合、裂变和虚化四个部分<sup>[7](P9-10)</sup>。霍现俊提出，《金瓶梅》的结构形式是在《三国演义》扇形网状结构的基础上采用了全方位的结网方式，它以西门庆的家庭为圆心，形成一种圆形网状结构<sup>[8](P105)</sup>。陈东有则把《金瓶梅词话》全书的总体布局概括为“以西门庆的家庭为结构核心，以西门庆的活动为结构线索，构成板块连接的结构形式”，认为全部故事形成了各具高潮的10个构造块，西门庆生子加官之时、李瓶儿之死及安葬之时、西门庆病死之时分别是第三、第七和第八构造块的高潮<sup>[9](P151)</sup>。孙秋克把《金瓶梅》概括为宗教意象群、

心理意象群、时间意象群、空间意象群和人物意象群,认为这五大意象群构成了小说叙事结构的基础<sup>[10](P69)</sup>。曾庆雨则指出,《金瓶梅》对人物的描写采用对比互衬的方式,对故事的情节组合采用点面浸染、以点带面的方式,对叙事背景的建构采用时空推移、纵横双向描写的方式;这种因人设事、以人物的行为和心理活动来带动情节的推进的叙事方式,与之前绝大多数叙事文本中因事设人、以情节引人入胜、以故事描写和陈述为文本的最大目的性的叙事方式显示出相当大的差异,真可谓是耳目一新<sup>[11](P17)</sup>。此外,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叙事节奏、叙事技巧等,都是围绕小说叙事这一中心来展开的讨论。总之,学界通过对结构艺术创新的论述,进一步肯定了《金瓶梅》的艺术价值与艺术贡献。当然,在肯定艺术价值的共识中也出现过不谐之音。如包遵信《色情的温床与爱情的土壤》即言:“我翻阅了近年一些《金瓶梅》论文,大都肯定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对它的艺术成就褒扬很多。最近读到美籍学者夏志清《金瓶梅新论》,对它的结构的凌乱、思想上的混乱以及引用诗词的不协调,均有论列。”<sup>[12]</sup>他判定《金瓶梅》在艺术上“恐怕只能归入三流”。此论一出,马上招致学术界的一致反驳,恰如刘辉在《〈金瓶梅〉研究十年》中指出:“从整体来说……《金瓶梅》在艺术上决非三流之作,而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上品。”的确,我们承认《金瓶梅》在艺术上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它在小说史上所体现的新的美学观念却标志着中国小说的长足进步——这不是量的变化,而是质的飞跃。

《金瓶梅》语言的丰富独特性,不仅成为文学研究者考察其作者、时代、蕴涵、审美风格等的重要切入点,也为语言研究者提供了鲜活丰富的语料库和活化石。因此,对小说语言的研究,也成为金学的一大热门,30年来发表的论文有数百篇之多,专著达到30多部,其涉及到语法、语音、方言、训释、溯源、句式、词汇、风格等方方面面,从书中张鸿魁、傅憎享等作者的精选文章可谓代表。关于小说语言研究的价值,张鸿魁说:“《金瓶梅》是一部划时代的文学巨著,也是一个空前规模的语言资料宝库。”<sup>[13](P1)</sup>“作为历史上的语言记录,《金瓶梅》是不可多得的材料。研究《金瓶梅》的语言,对于明代语言面貌的描写,对于汉语发展规律的探讨,对于现代汉语一些现象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应该引起语言学家的高度重视。”<sup>[14](P13)</sup>

除此以外,丛书所收洪涛的研究精选集,其倾力于《金瓶梅》的翻译出版研究,并梳理出各种外文译本的特点与命运,这些一则成为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则可见《金瓶梅》文本的世界意义与不朽价值。

### 三

通过以上简略的梳理,足见金学的骄人成绩与全面辉煌。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丛书所展示的金学成果的意义绝不仅限于金学本身,同时更具有文学史、学术史的重大意义。

首先,丛书涉及的各种问题及围绕热点问题的讨论,如作者、成书时代、成书方式等,意义已经远远超出所讨论问题的本身。在这种学术争辩中,不仅使《金瓶梅》的典范地位得以进一步确立,而且由此引发出关于中国古代长篇小说成书规律的探讨。比如

围绕作者问题的研究，尽管提出了几近 80 位的人选，且尚未有哪一说为学界普遍认同；但正如黄霖所说，这“不仅仅关系到一部书的一个作者研究问题，它实际上关系到如何对待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系列问题，关系到如何正确地估价学术研究的成败得失，乃至关系到文学研究的学风与思想方法等等”<sup>[15](P259)</sup>。学界由“世代累积说”与“个人创作说”的争论，引发对《金瓶梅》成书性质的思考，再由此衍生出更为重大的学术问题——对中国古代长篇白话小说成书过程、成书性质、生产主体乃至对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规律的深刻认知，从而使这一问题的讨论超越了金学本身，而具有了小说史的意义。

其次，大凡学术研究的各种视角、各种方法、各种风格，在丛书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中有文学的研究，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大宗，几乎每位学者都有相关选题；又有语言的研究，语音、语法、词汇、训诂等层面全面开花；有宏观的研究，如对《金瓶梅》艺术价值、美学贡献的研究和对它的小说史地位的论述；有微观的研究，如对小说政治、经济、文化等价值的分述；还有诸如小说作者、时代、成书、版本等成果丰硕，作为金学旨归的瓶内论述遍地开花。就研究方法而言，既有传统方法诸如政治的、社会历史的、文化的、哲学的、美学视角的阐释，又有对西方研究方法的借鉴参照；就研究风格而言，有文献翔实的缜密考证，有思辨词采兼擅的透彻阐释，有对域内文献的爬梳甄别，有对域外文献的搜集整理。总之，考证之眼、文学之眼、社会之眼、政治之眼、文化之眼等各种学术眼光、研究个性和宋学、汉学不同的治学路径，都在《金瓶梅》的研究中找到了用武之地。

其三，它是 30 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的晴雨表。从丛书所收论文的时间看，主要是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的研究成果——这 30 年正是中国大陆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学术研究走上正轨后金学最为辉煌的时期，丛书所展示的金学成果恰是 30 年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缩影。伴随着中国知识体系由传统向近现代的转型，《金瓶梅》作为“小说”的品格在 20 世纪前中期被固定了下来，而小说的诸多构成要素也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其叙事模式、写实特征、人物形象、类别归属等在文人的相关论述中均有涉及，批评方式也由传统的评点转化为专题的论著、论文，研究的路向随之变化，研究的方法随之拓展。《金瓶梅》的研究，与同期其他古代小说研究乃至古代文学研究同步，在中国学术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显示着不同的个性。比如关于人物形象的研究，明清评点派是道德式的随文感悟，20 世纪前期郑振铎等人侧重作品论析，20 世纪 50 年代孙述宇专于文本细读，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人物形象的研究从各个层面展开，并且终于确立为小说研究的核心范式之一，批评体例亦经历了由传统的点到为止的评点向系统的评论的转变。而伴随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变革，人物形象的内涵也得到不同视角的挖掘。如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金瓶梅》第一主人公西门庆在商业品性的基点上得到重新定位；随着“文化热”的出现，《金瓶梅》及其人物的文化品性得到挖掘；随着文学研究的多元化，《金瓶梅》研究在哲学的、心理的、历史的、美学的等诸多层面铺开。

其四，学界还由对《金瓶梅》的文学研究拓展到其他学科的界域，显现其作为文学文本的跨学科研究价值。比如，《金瓶梅》诞生于明代中叶，其保存了鲜活的民间语料，



受到了语言学者的高度重视。30年来,出现了大量针对《金瓶梅》的语言研究的新成果,由丛书中张鸿魁、傅憎享的专集可见一斑。

#### 四

丛书所折射出的学术精神与学术品格同样值得研究界珍惜和借鉴。

首先,由丛书反映出的对《金瓶梅》一系列热点问题的论争,可见金学界的质疑精神及对学术真谛的探索品格。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尊重权威但绝不迷信权威,敢于在权威论证的基础上对看似定谳但权威论证不足或失误的结论大胆质疑,进一步推动学术的发展。如鲁迅对于《金瓶梅》“世情书”的经典定位与类属评判高屋建瓴,为学人所折服,但有关《金瓶梅》最早刻本为万历庚戌本的推测却不免失误;郑振铎关于文本与社会生活关系的论述开拓了金学一个新的领域,但有关《金瓶梅》小说方言地域的说法却不免以偏概全;吴晗的历史考证法、文学社会学对《金瓶梅》作者、著作时代、社会背景的论述启发了金学新的研究路向,但其对史料的取舍却有不妥之处。针对权威说法的种种不足,金学界多在新材料与理性思考的基础上给予重新检视与重新论证,从而使学术结论更加科学。二是金学界内部学术争鸣的良好氛围,反映出这支研究队伍对真理的探索精神。文学作品文本的魅力在其多解性,研究中出现不同观点本属正常,比如对《金瓶梅》创作主旨、艺术价值、人物形象等见仁见智的论述,形成一个个研究热点,使作品的丰富内涵得到充分的挖掘;但有关作品作者、成书时代、版本等问题却有结论的唯一性,需要在厘清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得出一个可靠的结论,而围绕这些问题,在金学同仁尤其是金学扛鼎者如刘辉、黄霖等人之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种争鸣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完全出于对学术真理的追求。这种宽松、和谐的学术氛围,也为金学能够一步步走向深入和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学术研究的当代关怀,在这套丛书中也清晰可见。古代文学、文学乃至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在笔者看来,不仅仅在于对文化遗产价值的整理、挖掘与保存,更在于对其精华的继承与弘扬,激活其潜在的生命力,为构建当代文明提供滋养。在《金瓶梅》的研究中,学人始终不忘古为今用,对文本的当下价值给予高度关注。比如,《金瓶梅》孕育于16世纪复杂的文化背景之中,此期中国商业文明高度发达,西门庆形象融含着浓郁的商业文化因子,新时期的学人们曾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对西门庆形象的认知由单纯的形象本质认同深化扩展为文化意义的广泛探讨。这种研究视角的选择,取决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商业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背景,也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古代文学研究与当代社会问题的接轨,彼此之间的双向互动相互发明,凸显出古代文学研究的时代气息与当下意义。黄霖由《金瓶梅》所描写的官场的腐败与生活的齷齪,提出它是“暴露文学的杰构”<sup>[16](P1)</sup>,可“将《金瓶梅》当作反腐经典来读”<sup>[16](P25)</sup>;冯子礼更是将《金瓶梅》与上映3周票房超过4亿、刷新华语票房首映纪录、令无数青年人如痴如醉的青春偶像剧《小时代》电影进行比较,指出在人欲横流的现实面前,《金瓶梅》与《小时代》“何其神似乃尔”<sup>[17](P224)</sup>,从而对当今社会文艺的导向提出发人深省的警示。

对一个学科成就及生命力的衡判,除了对已取得成果的考量外,其能否可持续发展、发展后劲是否充足、研究是否后继有人,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金学的强大生命力,还表现在学会的精心组织策划、老一代学人的引领奖掖以及团体协作精神等方面,丛书也透露出了这方面的讯息。自1985年6月第一届全国《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召开以来,中国金学在中国《金瓶梅》学会和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的领导和筹划下,已经成功举办了18次大型学术会议(其中全国会议7次,国际会议11次)和几次重要的专题会议(如2002年5月临沂“《金瓶梅》邮票选题论证会”、2010年1月北京“《综合学术本金瓶梅》出版选题座谈会”、2010年4月黄岩“第八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筹备会”、2011年9月台儿庄“《金瓶梅》文化研究座谈会”、2014年6月峯城“电视连续剧《笑笑生传奇》剧本论证会”、2015年10月长春“《金瓶梅》文化高端论坛与版本文献展览”等)。吴敢说:“中国《金瓶梅》学会和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是工作比较规范、活动比较正常、成效比较突出、关系比较和谐、合作比较愉快的学术类国家一级(准一级)学会,中国《金瓶梅》学会和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有良好的会风、端正的学风与正派的作风。”<sup>[18]</sup>中国《金瓶梅》研究会是一个温暖的学术大家庭,在研究风气和学术氛围的营造、学术活动、热点问题的策划、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的开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每一次学术会议的召开,都会催生出一批学术成果,诸多学人都于此沾溉良多。丛书作者中不少人提到,自己研究成绩的取得,实与加入中国《金瓶梅》学会及中国《金瓶梅》研究会并在这个温暖的学术团体中有前辈的引领和奖掖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曾庆雨说:“在学术的道路上,其实每个人都需要引领和机遇,更需要鼓励和包容,尤其需要有一个宽松与严谨相结合的学术氛围。”<sup>[19](P208)</sup>她的专注于金学,就是得益于王汝梅、黄霖等学术前辈的引领。为金学殚精竭虑、贡献最多的掌门人吴敢曾多次谈到王汝梅多年来对其研究的关爱、督促与启导,从而使他的张竹坡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而吴敢又将这种关爱与奖掖施之于何香久、张进德、霍现俊、杨国玉等后来者。总之,正是历代学人的督导奖掖与薪火相传,才成就了金学的辉煌。

丛书的三位主编来自于海峡两岸,有着不同的学业经历与学术背景,但他们之于金学,除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享誉学界外,从策划、组织、联系、组稿到对几百万字稿子的审阅均付出了艰巨的劳动,三位主编之间、主编与作者之间、主编与书局之间的电邮通信累计有20余万字之多,体现出为金学乃至中国学术孜孜矻矻、甘于奉献的可贵精神;台湾学生书局高瞻远瞩,支持、推动学术发展,为繁荣文化事业勇于担当的使命感也可敬可佩。总之,是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的运筹帷幄,金学学人的不懈探索,各位主编的奉献精神,出版社的文化使命感,共同促成了这套丛书的问世,其意义不仅在于金学及中国学术本身,也启迪我们在文化建设事业上的新的思考。

#### 注释:

① 见李渔《三国志演义序》,清两衡堂刊本卷首。

② 甲戌本第十三回眉批。

③ 吴敢《金学丛书第二辑序》,台北:“金学丛书”(第二辑)卷首,学生书局,2015。

## 参考文献:

- [1] 张进德. 小说观念的巨大变革——论《金瓶梅》的贡献 [J]. 河南大学学报, 1992 (2). //张进德《金瓶梅》研究精选集 [M]. 台北: 学生书局, 2015.
- [2] 龚育之等.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M].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 [3] 吴敢. 金瓶梅研究史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5.
- [4] 《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刊印的几个问题 [A]. 河南大学学报, 2006 (1). //黄霖《金瓶梅》研究精选集 [M]. 台北: 学生书局, 2015.
- [5] 刘辉. 《金瓶梅》研究十年 [A]. 中国社会科学, 1990 (1). //刘辉《金瓶梅》研究精选集 [M]. 台北: 学生书局, 2015.
- [6] 许建平. 家庭叙事结构的原创性 [A] //许建平《金瓶梅》研究精选集 [M]. 台北: 学生书局, 2015.
- [7] 张远芬. 论兰陵笑笑生 [A]. 徐州教育学院学报, 1989 (2). //张远芬《金瓶梅》研究精选集 [M]. 台北: 学生书局, 2015.
- [8] 霍现俊. 论《金瓶梅》圆形网状结构的特点 [A] //霍现俊《金瓶梅》研究精选集 [M]. 台北: 学生书局, 2015.
- [9] 陈东有. 《金瓶梅词话》结构特征及其文化信息 [M] //陈东有《金瓶梅》研究精选集 [M]. 台北: 学生书局, 2015.
- [10] 孙秋克. 论《金瓶梅》的意象群叙事结构 [A] //孙秋克《金瓶梅》研究精选集 [M]. 台北: 学生书局, 2015.
- [11] 曾庆雨. 论《金瓶梅》的叙事建构及其叙说特征 [A] //曾庆雨《金瓶梅》研究精选集 [M]. 台北: 学生书局, 2015.
- [12] 夏志清. 《金瓶梅》新论 [J]. 读书, 1985 (10).
- [13] 张鸿魁. 金瓶梅语音研究·绪言 [A] //张鸿魁《金瓶梅》研究精选集 [M]. 台北: 学生书局, 2015.
- [14] 张鸿魁. 试论《金瓶梅》的语言研究 [A] //张鸿魁《金瓶梅》研究精选集 [M]. 台北: 学生书局, 2015.
- [15] 黄霖. “笑学”可笑吗? ——关于《金瓶梅》作者研究问题的看法 [A].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2007 (3). //黄霖《金瓶梅》研究精选集 [M]. 台北: 学生书局, 2015.
- [16] 黄霖. 黄霖《金瓶梅》研究精选集 [M]. 台北: 学生书局, 2015.
- [17] 冯子礼. 冯子礼《金瓶梅》研究精选集 [M]. 台北: 学生书局, 2015.
- [18] 吴敢. 为金学增光添彩——在第十一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总结发言. 2015年8月17日.
- [19] 曾庆雨. 曾庆雨《金瓶梅》研究精选集 [M]. 台北: 学生书局, 2015.